

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研究述评^{*}

熊 猛 叶一舵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福州 350007)

摘 要 城市农民工子女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他们一般为 6~18 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低于城市当地儿童, 社会认知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歧视知觉、相对剥夺感和身份认同危机, 情绪情感方面表现为情绪不平衡、孤独(抑郁)倾向较强和自卑(自责)心理严重, 社会适应方面显示出社会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学习适应性较差和问题行为较多。性别、年龄、人格、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等个体因素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因素是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还没有形成系统, 主要是一些质性的研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包括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及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加强等。

关键词 城市农民工子女; 心理健康; 机制; 教育干预

分类号 B844;R395

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形成了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的人口转移, 即“民工潮”(申继亮, 2009)。其中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是近年来民工流动的一个突出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举家迁移, 城市中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第二代移民——农民工子女。2000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 1 亿人, 其中 18 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少年占 19.37%, 约为 2000 万人。2003 年, 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 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达 1.14 亿人, 其中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已达 2430 万人; 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 6~14 周岁、处于义务教育适龄阶段的儿童少年约有 643 万人(吕文清, 2005)。但是, 这些随父母进城的适龄儿童少年,

却因我国以户籍为基础、以城乡分割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的存在, 在上学、升学等方面无法享有与当地儿童少年同等的权利, 从而形成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城市农民工子女(刘正荣, 2006)。

儿童少年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其心理发展过程及结果有着深刻的影响,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所指出: “与人生命的其他时期相比, 儿童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周围环境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陈家麟, 2002)。作为城市农民工子女, 面临家庭、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变迁和挑战, 在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下,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2003)中指出, “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 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切实关注和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并对这一群体的心理状况与需求进行系统研究, 有助于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素质的提高, 有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随着党和国家的大力号召及相关政策的陆续

收稿日期: 2011-05-10

^{*}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城市中小学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及其整合性教育干预研究”(FFB108082)和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城市中小学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制约因素及教育干预研究”(CB09-001)的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 叶一舵, E-mail: yeyiduo@163.com

出台(国务院办公厅, 2005; 国务院, 2006), 近 10 年来, 我国研究者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以及教育干预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概述, 从而为政府的相关决策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2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与辨析

2.1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

要准确界定城市农民工子女这一概念, 必须首先把农民工和城市农民工的概念界定清楚。关于农民工的概念, 国内有多种解释。夏延芳(2007)指出, “所谓农民工, 就是长期生活在城镇城市, 长期从事二、三产业劳动, 以此获得主要收入, 但户口仍在农村, 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鲁长芬等人认为,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业领域务工的劳动者, 是中国传统户籍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 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一类弱势群体(鲁长芬, 王健, 罗小兵, 胡庆山, 2005)。而国务院在《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这样定义: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 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狭义的农民工, 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广义的农民工, 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也包括在县城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 2006)。尽管从理论上可以界定农民工的内涵, 但农民工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表述也各有不同。然而各种表述基本都是围绕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和地域这四个层面揭示农民工的特征, 只是侧重点或研究角度不同而已。从此意义上讲, 国务院对农民工的界定应是最为完整、准确和权威的, 既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 又能表明其职业, 界定准确、全面, 能够从整体上揭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

而城市农民工也就是狭义的农民工(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也指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的工厂、机关、商店及服务部门劳动)。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 国内研究者没有对这一概念作具体的阐述, 但对与其相近的几个概念——“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流动儿童”进行过一些描

述。刘正荣(2006)认为, “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是指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 随同其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子女, 不包括没有随同其父母进入城市的子女, 一般是指称 6~14 周岁或 7~15 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而根据《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流动儿童少年是指 6 至 14 周岁(或 7 至 15 周岁), 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国家教委, 公安部, 1998)。另外, 申继亮等人主持的“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发展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课题组将流动儿童界定为: 6~18 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 且在当地学校就读的儿童青少年(申继亮, 2009)。

综合来看, 由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是由城市农民工的概念引申而来的, 且目前国内学者并未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作具体的界定。因此, 为了增进后续研究的深入和可比性, 同时也为了与相关概念区别开来, 我们借鉴城市农民工及流动儿童的概念, 尝试对城市农民工子女这一概念作一个操作性定义, 即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他们一般为 6~18 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

2.2 城市农民工子女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鉴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等概念常被混用, 这里有必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相关概念作一番辨析。

首先, 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区别开来。根据农民工子女居住的地域环境不同, 农民工子女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两类。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赵景欣, 2007)。城市流动儿童则指 6~18 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 且在当地学校就读的儿童青少年(申继亮, 2009)。这两类儿童随着居住地的变迁可以相互转换。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区别很简单, 即二者只是在居住地上存在差别, 前者居住在城市, 而后者居住在农村。而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流

动儿童在许多研究中被混用,但二者也存在着细微差别。从严格意义上讲,流动儿童少年群体中除了随同父母而进城的儿童少年外,还包括单独流入城市的流浪儿童少年、童工和寄养寄读的儿童少年等,而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儿童少年在成因与性质上与城市农民工子女有着很大的不同(刘正荣, 2006)。也就是说,城市流动儿童的外延比城市农民工子女更广,城市农民工子女只是城市流动儿童的一部分。

其次,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流动人口子女区别开来。中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城市流动人口的最主要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流动人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他城市来的白领群体(即也有城镇人口的流动),甚至还有其他国家来的人群。因而,流动人口子女在外延上明显广于城市农民工子女,城市农民工子女只是流动人口子女的一部分。

第三,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区别开来。有研究者把进城就业农民分为两类,即在城市受人雇佣从事非农职业的“受雇者”和做小买卖、开小作坊等的“自雇职业者”,并且认为城市农民工属于前者而不包括后者(刘正荣, 2006)。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根据前面的分析,城市农民工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这一核心概念包括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户籍在农村、有承包土地、从事非农产业和依靠工资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进城就业农民中的“受雇者”符合这四个要素,而“自雇职业者”只符合前三个要素,不符合第四个要素。因此,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外延比进城就业农民子女要窄,城市农民工子女只是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一部分。

由于城市农民工子女概念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将其与相关概念所作的辨析只是我们的一个尝试,然而却是必要的。概念的统一一方面有利于后续取样的精确、具体,研究的比较和延伸,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同时也说明这一领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3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

中国的城市农民工子女类似于国外的移民儿童(migrant children)或流动儿童(mobile children)。

一些研究表明,移民及与移民相关的过程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Guarnaccia & Lopez, 1998; Hicks, Lalonde, & Pepler, 1993; Stillman, McKenzie, & Gibson, 2009; Leavey, Rozmovits, Ryan, & King, 2007),移民儿童比当地儿童感受到更多的焦虑、抑郁和压力,更多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Stevens & Vollebergh, 2008; Mejía & McCarthy, 2010; Kupersmidt & Martin, 1997; Lindert, Ehrenstein, Priebe, Mielck, & Brähler, 2009)。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移民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比当地儿童差,认为移民过程中的种种挫折锻炼了他们的心理素质(Alati, Najman, Shuttlewood, Williams, & Bor, 2003; Bhugra, 2004),移民家庭内部的依恋关系和支持系统也是他们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性因素(Hackett, Hackett, & Taylor, 1991; Harker, 2001)。此外,国外的研究也报告移民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着性别(Vollebergh et al., 2005; Bengi-Arslan, Verhulst, Van der Ende, & Erol, 1997; Beiser, Hou, Hyman, & Tousignant, 2002; Stevens et al., 2003)和年级(Bengi-Arslan et al., 1997; Stevens et al., 2003)差异。中国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某些相似之处。下面,我们主要从总体水平、社会认知、情绪情感和社会适应这几个主要方面对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作一个概括。

3.1 总体水平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以往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与外部进行比较,即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当地儿童进行对比研究;二是内部比较,即将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与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对比研究。

目前国内对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当地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即基本都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要差于城市当地儿童。例如,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和兰菁(2009)对1164名流动儿童、525名北京儿童和568名农村儿童的调查显示,不同类别儿童(流动儿童、北京儿童和农村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儿童在社交焦虑、孤独感上最差。韩焱和吴汉荣(2010)对深圳市流动儿童的调查表明,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较常住儿童差,流动男童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

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总焦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男童,流动女童的学习焦虑、恐怖倾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女童。刘正荣(2006)对扬州市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调查显示,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12.9%,高于城市儿童(11.7%);且其心理健康总平均分为39.84,显著高于城市儿童(35.62)。朱丽娜(2008)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研究也表明,虽然从整体上来看,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感较高,但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整体上低于城市少年儿童。

对于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女与打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女的对比研究,国内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出入。大量研究表明,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要好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袁立新,张积家,苏小兰,2009;刘正荣,2006;王瑞敏,邹泓,2010),认为就读于公立学校比打工子弟学校更有利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另外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蔺秀云,方晓义等,2009;邱达明,曹东云,杨慧文,2008),认为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更有利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该研究结果也对国家相关部门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而出台的“由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提出了质疑。

我们认为,上述调查结果之所以会出现悬殊,除了有各地区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政策差异及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因素外,也可能与调查抽样代表性上的偏差有关。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3.2 社会认知

对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认知状况,研究者们主要从对其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大的歧视知觉、相对剥夺感和身份认同危机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3.2.1 歧视知觉

所谓歧视知觉(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即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种族、户口身份等)而受到了有区别的或不公平的对待,它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Major, Quinton, & McCoy, 2002)。城市农民工较多从事一些较脏较累的工作,城市农民工子女与

父母一起生活在大城市的角落和边缘,经常会体验到一些歧视和不公平现象(刘霞,2008)。目前,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歧视现象已经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邹泓、屈智勇和张秋凌(2004)通过调查发现,在城市农民工子女是否向家长抱怨受到过歧视方面,24.7%的孩子抱怨过城里人看不起他们,29.3%的儿童“有点担心”城里的孩子看不起他们;打工子弟学校的儿童比普通公立学校的儿童更加担心被人看不起。胡进(2002)的调查结果显示,有11.5%的农民工子女“非常担心”城市里的学生看不起自己,有23.1%的农民工子女表示“有点担心”。雷有光(2004)的调查也表明,近80%的农民工子女“不愿意”将来过父母现在的生活,其主要原因是“被人瞧不起”,这说明农民工子女已经明显感受到了父母较低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待遇。方晓义、范兴华和刘杨(2008)的研究甚至发现,75.5%的农民工子女报告受到过歧视,但所报告的被歧视的体验并不强烈。可见,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学校、社会等方面已普遍面临着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社会排斥”,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堪忧。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疏导,不帮助他们正确对待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很可能会导致其产生抵触社会的心理,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刘霞,2008)。

另外,也有大量研究对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知觉进行了对比研究,其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即普遍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被歧视感要强于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蔺秀云,方晓义等,2009;李晓巍,邹泓,张俊,杨颖,2008)。这说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感受到更多的歧视体验。虽然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减少了与城市儿童互动的机会,在客观上降低了遭受同龄城市儿童歧视的可能性,但城市农民工子女感受到的歧视不仅仅来自于学校内部,更来自更大的社会范围。也许在城市农民工子女看来,自己所上的打工子弟学校本身就标明了社会对自身身份的歧视(袁立新等,2009)。这也提示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要尽快落实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地位,对打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学校要一视同仁,从而在外部环境上尽量减少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知觉。

3.2.2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指人们通过

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其产生主要源于参照群体的选择,而与自身利益的实际增减并无直接联系(郭星华,2001)。城市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不断地转移,成长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其心理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他们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不能恰当定位,把城市孩子作为参照物,与之比较,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失去得太多,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这种主观的“相对剥夺感”(李宁,2008)。文献回顾发现,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相对剥夺感主要表现为敌对、心理不平衡和不公平感等。例如,邱达明等人(2008)的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子女在敌对、心理不平衡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雷有光(2004)通过调查发现,49%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儿童认为自己不能像北京孩子一样上公立学校不公平,这些儿童对自己所受的对待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并且与其他儿童相比,他们对所受到的不公平更敏感,要求改变自己外地人身份、贫穷和低劣学习条件的要求也更为强烈。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2006)的研究也显示,流动儿童由于感觉到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极容易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反感情绪,有时会对周围的人甚至对社会产生敌意,最终导致问题行为的出现。另外,部分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管理不善以及安全卫生隐患严重等问题,使城市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也易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平等感、对立感。

3.2.3 身份认同危机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性往往会导致他们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受户籍身份的影响,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是城里人,而是农村人和外地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繁华热闹的城市生活、学习与居住,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熏陶,对于农村文化的感受与印象并不是很深,对农村的认同感也在减弱。虽然身处城市,却不是城市里的人;远离了农村,不再是完全意义的农村人,从而成为一个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夹缝者”与“边缘人”。郑友富和俞国良(2009)对浙江省527名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农村儿童的有55.22%,模糊认同的有22.01%,摒弃农村儿童身份的有22.77%,说明城市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困惑带有普遍性。白文飞和徐玲(2009)在北

京市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表明,不论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客观的社会定位,都表明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他们在城里人与农村人两种身份之间挣扎、徘徊,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双重边缘人。调查还显示,78%的农民工子女喜欢和城市小朋友一起玩,但出去玩或者购物的时候,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流动人口身份,这是一种复杂心态的表现,可见“外来人口”的身份已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扰(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2006)。

3.3 情绪情感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情绪情感状况,通过归纳分析发现,主要表现在情绪不平衡、孤独(抑郁)倾向较强和自卑(自责)心理严重三个方面。

3.3.1 情绪不平衡

城市农民工子女在情绪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平衡状况。例如,陶红梅等人的研究表明,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存在轻度心理问题,其中情绪不平衡排在其心理问题的第二位(陶红梅,许燕,张小方,顾莉莉,洪金侠,2004)。邱达明等人(2008)的调查显示,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在情绪不平衡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儿童学校的儿童和公立学校中的当地儿童。而袁立新等人(2009)的调查则表明,公立学校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都表现出较多情绪不平衡的心理问题,但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表现得更为严重。另外,王瑞敏(2007)对北京市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则发现,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城市农民工子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情绪不平衡状况,至于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问题则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之一。

3.3.2 孤独(抑郁)倾向较强

孤独感是个体适应社会的重要指标,是个体认识到其期望达到的和实际达到的社交网络模式存在差距而产生的不愉快的情绪体验(Peplau & Perlman, 1982)。由于语言、综合知识、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工子女常常受到城市儿童的排斥和歧视,不善交往、朋友少的现实更使许多农民工子女常常感到“我没有一个好朋友”而陷于孤独情绪之中;也有的农民工子女常常认为别人感兴趣的东

在群体之外,处于孤立无援、无人理解的孤独境地(孙维平,胡韬,郭跃勤,周林海,2007)。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孤独感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和农村儿童(蔺秀云,方晓义等,2009;胡宁,方晓义,蔺秀云,刘杨,2009;刘芮斐等,2010);有二成学生存在与孤独有关的事实,有一成多的学生有孤独的体验(胡进,2002)。另外一些研究则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认为农民工子女总体孤独感较低(张华,谢云天,2008),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林盈盈,2010)。从总体上来看,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孤独(抑郁)水平要高于城市当地儿童。提示学校和社区要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让城市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儿童的学习、生活之中,从而切实降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孤独和抑郁倾向。

3.3.3 自卑(自责)心理严重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自卑(自责)心理,国内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即基本都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自卑(自责)心理较城市当地儿童要严重。如孙维平等(2007)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存在自卑心理,有的认为自己在学业上“先天不足”,有的常常抱怨自己“无能”,有的由于家庭条件比城里儿童差,从而自认为“低人一等”,有的认为自己“无任何可取之处”。何桂宏(2009)的调查也发现,近四分之一的流动儿童长期笼罩在自卑心理的阴影下,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发展受阻以及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研究还表明,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非流动儿童(刘芮斐等,2010),流动人口子女在“幸福与满足感”和“躯体外貌与属性”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极的自我评价(胡进,2002),农民工子女在自责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城市本地学生(胡韬,郭成,2007;韩焯,吴汉荣,2010)。这提示我们要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这一情绪状况开展有针对性的调适与辅导,增强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

3.4 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指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黄希庭,杨治良,林崇德,2003)。由于年龄和身份的特殊性,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有其特殊性,即与其他生活于单一生活环境中的儿童(如城市儿童或农村儿童)相比,他们的

社会适应过程多了一层适应新社会环境的任务。下面主要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总体社会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和行为适应等方面对其社会适应状况作一番概括。

3.4.1 社会适应不良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是他们在新的环境下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它反映出农民工子女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和融入程度。城市农民工子女从农村来到城市,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在心理和行为上加以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内隐问题和外显行为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包括学校适应)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和问题。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胡韬,2007);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差于混合校流动儿童(柯锐,2007);女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年级差异显著,总体上呈现随年级升高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发展趋势(胡韬,2007)。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性较差(谭千保,2010;孙晓莉,2006);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水平明显低于本地儿童,流动女生学校适应的总体水平高于男生,小学四、六年级学生学校适应的总体水平高于三、五年级学生(王洋,2007)。

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总体良好(朱丽娜,2008),只有少数学生对城市生活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杨小艳,2007),有研究甚至发现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得分高于本地少年儿童(江君琴,2009)。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可能并不是完全按照“处境不利(高危)—压力—适应不良”的直线模型发展的。事实上,根据心理弹性的相关理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也可能遵循着“处境不利—心理弹性—适应良好”的轨迹发展(赵淑娟,郑秀娟,刘嘉邦,2009)。这些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证实。

3.4.2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人际适应问题,国内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即总体来看,城市农民工子女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如王飞(2009)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发

生率为18.73%，其中排在首位的影响因子即为人际敏感。袁立新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都表现出较多的人际关系敏感与紧张的心理问题，但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表现得更为严重。孙维平等(2007)的访谈结果也显示，40%左右的农民工子女感到“与新朋友在一起时不好意思接近”，课堂讨论时他们怕自己言语不当而不敢与同学沟通交流，在课外活动中也不能与伙伴进行很好的沟通、合作。研究还表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和农村儿童(胡宁等，2009)，他们的同伴接纳感偏低、孤独感偏高(朱丽娜，2008)，流动女生的人际适应(同伴交往)优于男生(孙晓莉，2006)。可见，构建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交流和互动平台，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3.4.3 学习适应性较差

学习是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学习适应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田澜，2004)。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学习适应性状况，研究表明其学习适应性低于常模水平(刘磊，符明弘，范志英，2010)；学习焦虑显著高于城市本地学生(胡韬，郭成，2007)，表现出较多的学习压力感(袁立新等，2009)；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学习习惯较差(孙维平等，2007)；学习方法了解较少(何光峰，2002)；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不及城市本地儿童(蔺秀云，王硕，张曼云，周冀，2009)。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总体学习习惯较好(张华等，2008)；学习态度端正，学业表现良好(朱丽娜，2008)。另外，有研究还表明，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的因素不是智力因素，而主要是非智力因素以及学习方法方面存在问题(何光峰，2002)。这提示有关学校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

3.4.4 问题行为较多

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指个体表现出的妨碍其社会适应的异常行为(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5)。Achenbach把儿童的问题行为分为两类：内化问题行为与外化问题行为，前者指焦虑、抑郁、孤僻、退缩等情绪问题，后者指攻击反抗、违纪越轨、过度活动等行为问题(Achenbach，

McConaughy, & Howell, 1987)。问题行为阻碍儿童个性、社会性的发展，对其身心健康十分不利，其严重程度可以是普通的不良行为，也可以发展为反社会行为。总体来看，城市农民工子女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外化问题行为，主要表现为网络成瘾、吸烟以及攻击性行为等。如李晓巍、邹泓、金灿灿和柯锐(2008)的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的自我报告率分别达到了31.0%和20.1%，与城市儿童相比，其内化问题行为较为突出。金灿灿、屈智勇和王晓华(2009, 2010)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网络成瘾倾向比率为12.99%，高于留守儿童(6.83%)和普通儿童(6.82%)；流动和留守儿童平均吸烟年龄为10.2岁，而流动儿童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最小，为9.4岁。研究还发现，流动儿童交通和游泳相关危险行为以及经常被打骂的发生率均高于本地儿童(翟蕾，黄娜，2008)，校园暴力和越轨行为时有发生(殷世东，王守恒，2009)。

另外，有研究还表明，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儿童行为问题的因素有父母职业、婚姻状况、母亲的生育年龄、是否为亲生母亲和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儿童健康状况、主要抚养人以及学历等(刘晓瑛，宋媛，陆艳红，冯梅珍，顾珏，2006)。从而提示我们可以从这些因素入手，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问题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矫正。

4 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国外的研究表明，预期的歧视、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总体幸福感、自我效能、自尊、社会支持、移民前的文化适应和准备状态等会对移民的心理健康(主要是压力、焦虑和抑郁等)产生重要影响(Jasinskaja-Lahti & Yijälä, 2011; Hovey & Magaña, 2002; Griffin & Soskolne, 2003; Leavey et al., 2007)。我国的大量研究显示，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

4.1 个体因素

目前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人格、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

4.1.1 性别

性别是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总体上来看,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男生。例如,蔺秀云等人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女孩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男孩(蔺秀云,方晓义等,2009)。刘正荣(2006)的调查表明,不同性别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在心理健康总分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女童的得分高于男童。何亚玺(2009)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存在男女差异,女生心理健康不如男生。研究还表明,农民工子女中女生的积极情感显著低于男生(龚田波,2007)。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城市农民工子女中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给予她们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4.1.2 年龄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年级差异,说明年龄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亚玺(2009)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存在年级差异,他们的心理健康呈曲线发展,即3~4年级学生健康水平呈下降趋势,4~7年级学生健康水平整个呈下降趋势,但是5~6年级学生健康水平呈轻微上升趋势,7~8年级学生的健康水平呈大幅度上升趋势。龚田波(2007)的调查发现,在快乐感上,初一的农民工子女显著高于初二,在积极情感上,初一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另外,由于生活空间场所的频繁变动、获取就学信息的不足,以及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收费、居住地的距离和所使用教材等因素的考虑,一些农民工子女往往在城市里不能顺利就学,从而造成他们与所读年级的正常年龄相比偏大,无法很好地与同学交往,导致其对人焦虑和孤独倾向水平较高(刘正荣,2006)。

4.1.3 人格

城市农民工子女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容易形成既不同于城市同龄儿童又不同于家乡同伴的边际人格,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必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王瑞敏和邹泓(2008)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掌控感和乐观对主观幸福感有着稳定且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大五人格起着主要的预测作用。柯锐(2007)的研究表明,人格五因素中的外向性、开放性和宜人性能正向预测,情绪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自尊;外向性能正向预测,情绪性和开放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情绪性和开放性能正向预测,宜人性和谨慎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情绪性和开放性能正向预测,外向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李晓巍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人格的情绪性、开放性显著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外向性、家庭功能的亲密度显著负向预测其内化问题行为,宜人性和谨慎性、亲密度显著负向预测其外化问题行为;另外,人格在家庭功能的亲密度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亲密度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李晓巍,邹泓,金灿灿等,2008)。可见,人格是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

4.1.4 应对方式

前面的分析显示,城市农民工子女受到来自社会、学校、教师和同伴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而通过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分析发现,应对方式是影响歧视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方晓义等人(2008)的调查显示,消极应对在流动儿童是否遭受歧视与孤独关系上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积极应对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积极应对对受歧视流动儿童受歧视程度与孤独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消极应对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屈卫国、钟毅平、燕良弼和杨思(2008)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子女在面对压力时,他们与城市孩子的应对方式在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忍耐、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6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农民工子女心理压力比城市孩子大;在面对压力时,农民工子女倾向于较少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见,城市农民工子女对其不良处境的消极应对方式是其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4.1.5 生活满意度

城市农民工子女对其生活的满意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也是其生活的两个主要空间):

一是对所在学校的满意程度。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2006)的调查发现,流动儿童最满意所在学校的教学水平,最不满意学校的硬件设施。刘正荣(2006)的调查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对就读学校的满意度(66.9%)低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93.2%),而不满意度(6.9%)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2.7%)。城市农民工子女对就读学校的不同满意水平,不仅会影响

他们对自己学习过程及结果的焦虑水平,影响他们对就读学校的归属感以及与同伴的正常交往,而且还会影响他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态度。

二是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刘正荣(2006)的调查显示,对现在生活不同满意水平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在心理健康总分及学习焦虑、对人焦虑、身体症状和冲动倾向等项目的得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张枫、王洁、殷兰青和任智红(2003)对无锡市区部分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分析也指出,36.6%的流动儿童对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太满意,7.5%为极不满意,其中以生活环境、自我认识、抑郁体验、焦急体验、躯体情感满意度较低。从而提示我们要关心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居住、学习、物质生活及心理健康,鼓励他们自尊、自强、自信、自爱,促进其健康成长。

以上研究探讨了性别、年龄、人格、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等个体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除此之外,个体因素中的自我效能感(刘茜斐等,2010)、自尊(蔺秀云,方晓义等,2009)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自尊可能是其应对压力、保持良好的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曾守铨,2009)。另外,以往研究大多从一些消极方面探讨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危害因素,而较少探讨对其心理健康起保护作用的积极因素(如心理韧性、感恩、宽恕等)。因此后续研究需加大这一方面的研究力度,从而真正为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教育干预找到突破口和动力。

4.2 环境因素

4.2.1 家庭因素

目前研究主要关注父母职业及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和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首先是父母职业及家庭经济状况。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对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刘正荣(2006)的研究表明,单纯从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父母收入状况来看,不同父母收入水平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之间在心理健康总分、学习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等项目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相对而言,父母收入水平高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些,反之则差些。陶红梅等人(2004)的调查也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的父母自身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平

均水平为初中文化程度;而从其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来看,工种多样,就业类别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因此,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及工作强度大、收益低这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父母对孩子在教育和成长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入,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

其次是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使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我和社会,促进其社会化的健康发展。刘正荣(2006)的调查显示,生活在良好亲子关系中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其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好,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等水平低。柯锐(2007)的研究也表明,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亲子沟通的得分,亲子沟通的主动性,与父母沟通的频率、时间都显著低于城市儿童,感觉到与父母沟通有困难的流动儿童比例也显著高于城市儿童。可见,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亲子关系和亲子沟通不及城市儿童,从而对其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最后是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个体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一则使得个体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二则使得个体的正常社会化进程被迫中断,从而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刘正荣(2006)对292名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调查显示,已搬过家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有226人(占77.4%),这种住所的变动使得进城就业农民子女面临再次适应新的环境(其初次适应新的环境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其社会化的进程再次被迫中断;无论是生活空间场所的初次变动,还是生活空间场所的再次变动,对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都产生了消极影响。陶红梅等人(2004)的调查也表明,环境的时常变迁往往导致流动少年儿童不易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相对稳定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人际交往方面被认同、接纳和支持的需要也得不到充分满足,因而他们容易变得敏感,容易形成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些都提示我们,提高城市农民工子女生活空间和生活场所的稳定性对于保持其一个健康良好的心理状况至关重要。

4.2.2 学校因素

学校教育对少年儿童的成长关系密切,学校

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教师和同伴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明庆华(2003)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子女即便获得了就地入学的机会,但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对待与歧视的事情时有发生,极少数教师甚至是公然地“歧视”。张秋凌、屈智勇和邹泓(2003)的访谈发现,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因为户籍制度和流动性大而导致入学难问题普遍存在;歧视现象普遍存在,流动儿童感受最强烈的是同伴交往中的歧视,有儿童认为“他们有时瞧不起我们,给我们白眼,不和我们玩。”

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水平。近年来诸多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因为办学资金短缺、办学条件简陋、教学设施缺乏、师资力量不足而没有获得合法办学资格;学校教师大部分工资偏低,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教学主动性和积极性,因而也可能造成对学生的身心成长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关心不够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表现出较忽视学生的心理成长(陶红梅等,2004)。有学者(刘正荣,2006)曾这样描述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从整体来看,流动儿童学校的现状令人堪忧。在硬件设施的建设、师资队伍、教学和管理等方面,基本都合格的流动儿童学校为数不多,几乎所有的流动儿童学校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由此可见,打工子弟学校令人堪忧的办学条件是城市农民工子女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外界诱因。

4.2.3 社会因素

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现行的户籍制度、教育上的不平等和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等。

一是现行的户籍制度。按照我国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流入城市生活,但在户籍上仍然属于农村人口,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不但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不能享受到与流入城市当地儿童同等的权利与保障,而且还要遭受各种社会排斥以及不公正待遇。户籍制度把城乡隔离是其受歧视的根源,也是他们不能获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接受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地位的原因(刘正荣,2006)。

二是教育上的不平等。首先表现为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子女由于政策上或经济上的原因,只能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差一些的公立学校,而城市农民工子女所上的这两类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队伍和教育教学水平都明显差于城市公立学校。其次表现为入学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借读生与正式生在教育上存在差异,如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班级总评,不能参加一些竞赛和评比活动等(李宁,2008)。

三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城市农民工子女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此时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周围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往往会决定其能否形成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正确看法,从而直接影响到其健全人格的形成。陶红梅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城市与农村环境之间的差异,城里人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和文化适应。曾守锤(2008)关于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调查则显示,城市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持中立且稍微偏积极的态度,在大多数测题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家长持消极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不受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祖籍、子女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毋庸置疑,城市居民对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不同态度,会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上述研究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探讨了环境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影响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环境因素远不止这些,父母教养方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班级环境、社会支持、社区文化氛围等因素也可能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水平产生影响。另外,外界环境因素最终要通过个体的内部因素起作用,因此,后续研究应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结合起来,探讨环境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影响的内部机制,如个体因素在环境因素影响心理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等。这些当是未来研究的重要主题。

5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研究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西方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教育干预项目,也有学者进行的微观干预实验研究。在美国,针对流动儿童教育

干预的最大项目是流动教育项目(Migrant Education Program, MEP),它是在国会修订的《初中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的,指由联邦提供财政资助,州负责实施,针对流动儿童实施的正规学校教育以外的补充教育。MEP方案主要包含以下执行方案:1)教育或与教育相关的方案,即能够直接帮助流动儿童取得学业成功的方案,这类活动在资金分配上享有优先性;2)其他方案,即与教育无直接关系的必要方案,如与识别和确认流动儿童并登记注册相关的方案(Branz-Spall & Wright, 2004)。另外,西方学者也通过自然实验对移民及其子女的心理健康、吸烟和酒精滥用行为进行了标准化的教育干预研究(Elder et al., 2002; Stillman et al., 2009)。

相对于西方国家对移民儿童的教育干预既有国家层面的项目支持,也有民间的自发研究,中国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还没有形成法规文件,主要是一些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在进行相关的调研工作和呼吁。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所的研究团队(2002)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价值观、学习、生活技能和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干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心理健康方面,胡进(2002)对北京市某打工子弟学校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干预。主要采用个体干预(主要通过心理周记这种形式与实验班每个学生进行书面交流)和群体干预(开展心理健康专题活动课,包括“正确评价自己的外貌”、“欢乐可爱的家”、“人际关系你我他”等主题)两种形式,具体手段包括讨论、故事、表演、操作等,让学生充分体验。结果发现学生们喜欢、接受这样的心理干预形式,并从心理干预活动课所设计的讨论、作业中获得了启发与进步。

价值观方面,杜文平(2002)根据前期调查结果进行了“流动人口子女价值观的教学干预研究”。主要采取绘画,讲故事,看地图、认地图、画地图,专题活动等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干预活动。结果显示,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干预,孩子们在思想认识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不再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孤立的小岛上;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增强了自信心,更加渴望学习,渴望求知;师生情感融洽了,孩子们和城里人之间的差距、自卑感消除了,他们变得乐观、热情,积极

向上。

学习方面,何光峰(2002)通过前期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学习的因素不是智力因素,而主要是非智力因素以及学习方法方面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们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干预:1)以上课发言为突破口,培养学生的自信心;2)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3)采用激励措施,提高学生学习的动机;4)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一年的教育干预,发现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学习适应性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生活技能方面,马莉(2002)针对流动人口子女进行了“生活中的安全”专题的学习。他们利用自编教材,以授课形式进行干预,干预内容包括“交通安全”、“学校中的安全”、“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小学生常见伤病的自救和救护知识”、“小学生在家的安全”、“小学生外出时的安全”等。通过各个专题的学习,学生们在掌握安全知识和规则、培养安全自护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明白了“安全第一”的道理。

家庭教育方面,周芳(2002)主要从改善家长的教子言行入手去帮助他们。根据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他们尝试创办了专为流动人口家长看的报纸——《家长报》,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通过孩子将报纸送交到每个家长手中。通过这份小报,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教观念,指导其了解有关的法规常识,还向他们介绍儿童身心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具体讲解科学教子的基本知识与方法等。通过对流动人口家庭所进行的一年的教育干预,取得了一定成效,家长作为教育者的意识逐渐增强,与学校教育的配合也越来越多。

另外,也有研究者(郭志巧, 2007)从社会工作反歧视的视角提出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干预模型,其具体的工作方法包括:1)干预的重心领域,涉及到城市的公共政策和资源分配;2)干预的工作对象,包括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学校,同龄城市儿童及其家长、家庭所在社区;3)干预的具体层面,包括情感和情绪层面、观念和意识层面及行动层面;4)干预的技术性问题,主要包括关系处理的技巧性,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混合运用,多视角的运用等。

从以上教育干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研究者已经对流动人口子女(主要是城市农民工子女)在

城市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干预实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教育干预研究都只是一些质性的研究,从干预方案的制定、干预过程的实施到干预效果的评估都缺乏系统的量化指标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同时干预的整合性也有待加强。

6 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展望

近10年来,我国研究者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现状、影响因素及教育干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所在。

6.1 研究对象有待拓宽

关于研究对象上的拓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研究取样的拓宽。主要表现在研究者选取的城市农民工子女几乎都是在校的农民工子女,那些非在校的适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和心理健康状况很少有研究者关注。而这部分儿童青少年与在校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是有差别的。另外,大多研究者只选取如北京、上海、武汉、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作为被试,而忽略对小城市或一些经济发达的县镇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研究。二是研究角度的拓宽。一些与城市农民工子女关系密切的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如家长心理健康与学生心理健康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教师心理健康与学生心理健康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6.2 研究内容有待拓宽

目前研究内容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状部分,探讨城市农民工子女的适应困难和心理问题居多,而较少关注其积极心理。研究者普遍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存在认识偏差,常给他们贴上“城市边缘群体”或“心理弱势群体”的标签,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发展必然遵循着“处境不利(高危)—压力—适应不良”的直线模型。然而根据心理弹性的相关理论,城市农民工子女也可能遵循着“处境不利—心理弹性—适应良好”的轨迹发展(赵淑娟等,2009);有的城市农民工子女可能会适应良好甚至是很出色,生活的挑战没有难倒他们反而锻炼和塑造了他们积极的心理品质,如

独立、乐观、包容、感恩、抗力性等(辜美惜,郑雪,邱龙虎,2010)。另外,Keyes在积极心理学的启示下,提出现代心理健康模型应该是双因素模型,即认为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是两个不同的因素,而不是同一个因素的两极,心理疾病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的存在;心理健康还意味着正向力量或积极品质的产生与增加,积极心理健康才是一个完全处于最好的健康状态(苗元江,赵娜,2009;陈晓娟,任俊,马甜语,2009)。这提示我们,要准确描述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仅仅关注其消极方面是不够的,也要关注他们的一些积极的心理品质和心理状态,如独立、韧性、乐观、美德、心理资本等。二是影响因素部分,以往研究多是探讨某一类因素下某些具体变量(如性别、年龄、家庭等)单独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则较少涉及,如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以及这两类因素中的具体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这些都是契合城市农民工子女生活实际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下一步研究必须重点关注的。

6.3 研究方法有待完善

目前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有三点。一是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调查法和访谈法,少有实验研究,特别是教育干预实验研究。这就直接导致国内学者虽然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出了诸多对策和措施,但大部分只是限于理论探讨,有的甚至只是一种口号或者大方向,缺乏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因此,后续研究应重点开展教育干预实验研究(特别是整合性教育干预研究),从而探索出适合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可操作性强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二是已有的研究多采用横断研究,少有纵向追踪研究,从而难以揭示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的动态规律。研究表明(刘正荣,2006),进入城市生活的时间、空间场所的变动等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说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可能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水平要差一些,随着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心理健康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当然也可能是其他情况。因此,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多次观测和追踪研究,再辅以多层线性模型的统计技术,就可以考察农民工子女(个体或群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考察性别、人格等个体因素以及

父母教养方式、班级氛围等环境因素对其心理健康发展趋势的影响。三是缺少完善统一的研究工具。不同研究者用于研究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工具各不相同,这就直接导致各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研究也失去了可比性。另外,已有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大多是针对一般青少年的,很少有专门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契合其学习、生活情境的测评工具。因此,后续研究应编制开发出一套信效度较高的适合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测评量表。

6.4 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有待加强

虽然至今有关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研究颇多,但研究主题众多,探讨的影响因素繁杂,缺乏整合和相应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影响因素模型的建构),更未见系统的、可操作性强的整合性教育干预方案。很多研究只能揭示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现状、影响因素和教育干预的某一方面,这必将影响研究结果的推广和应用。因此,后续研究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采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大样本广泛施测,从而进一步理清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相关影响机制;二是适当采用元分析技术,对近年来在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做个梳理,揭示出这些研究中的问题及一般结论;三是尝试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 and 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建构。如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理论就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的传统模型“处境不利(高危)—压力—适应不良”提出质疑,认为流动儿童也可能遵循着“处境不利—心理弹性—适应良好”的轨迹发展(赵淑娟等,2009)。这一模型建构逻辑对于我们构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发展和影响机制模型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流动人口大量增加。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现有流动人口26139万人,同2000年相比增长81.03%(国家统计局,2011)。而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作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做好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一环,也是摆在教育与心理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系统研究和教育干预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 白文飞,徐玲.(2009).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18-25.
- 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2006).北京市流动儿童学校师生心态状况调查研究.《新视野》,(3),62-64.
- 陈家麟.(200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原理与操作》.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陈晓娟,任俊,马甜语.(2009).积极心理健康的内涵解析.《心理科学》,32,487-489.
- 杜文平.(2002).流动人口子女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教育科学研究》,(11),51-52.
- 方晓义,范兴华,刘杨.(2008).应对方式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情绪关系上的调节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4,94-99.
- 龚田波.(2007).《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自尊、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
- 辜美惜,郑雪,邱龙虎.(2010).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现状述评.《心理科学》,33,910-912.
- 国家教委,公安部.(1998).《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1998-03-02,取自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8/206002199801.html>
- 郭良春,姚远,杨变云.(2005).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少年城市适应性研究——北京市JF中学的个案调查.《中国青年研究》,(9),50-55.
- 国务院办公厅.(2005).《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2005-08-14,取自 http://www.gov.cn/zwggk/2005-08/14/content_22464.htm
- 国务院.(2006).《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03-27,取自 http://www.gov.cn/jrzq/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
- 郭星华.(2001).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71-78.
- 郭志巧.(2007).社会工作反歧视视角在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中的运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35-38.
- 韩焯,吴汉荣.(2010).深圳市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中国学校卫生》,31,64-65.
- 何光峰.(2002).流动人口子女学习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教育科学研究》,(11),53.
- 何桂宏.(2009).流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自卑感研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6,4-7.
- 何亚玺.(2009).《北京市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及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
- 胡进.(2002).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教育科学研究》,(11),52-53.
- 胡宁,方晓义,蔺秀云,刘杨.(2009).北京流动儿童的流动性、社交焦虑及对孤独感的影响.《应用心理学》,15,

- 166-176.
- 胡韬. (2007). *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 胡韬, 郭成. (2007). 重庆市农民工子女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中国学校卫生*, 28, 745-746.
- 黄希庭, 杨治良, 林崇德. (编). (2003). *心理学大辞典*.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江君琴. (2009).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现状调查及对策——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 金灿灿, 屈智勇, 王晓华. (2009). 流动和留守儿童吸烟行为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中国特殊教育*, (11), 70-74.
- 金灿灿, 屈智勇, 王晓华. (2010). 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网络成瘾现状及其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 *中国特殊教育*, (7), 59-64.
- 柯锐. (2007). *北京市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 雷有光. (2004). 都市“小村民”眼中的大世界——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认知的调查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6), 27-31.
- 李宁. (2008). 透析农民工子女的“相对剥夺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30, 121-124.
- 李晓巍, 邹泓, 金灿灿, 柯锐. (2008). 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与人格、家庭功能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4, 54-59.
- 李晓巍, 邹泓, 张俊, 杨颖. (2008).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产生机制的质性研究: 社会比较的视角. *心理研究*, 1, 66-70.
- 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编). (2005). *心理学大辞典*.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蔺秀云, 方晓义, 刘杨, 兰菁. (2009).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心理学报*, 41, 967-979.
- 蔺秀云, 王硕, 张曼云, 周冀. (2009). 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因素——从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学习投入角度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41-47.
- 林盈盈. (2010). *南宁市流动儿童孤独感、自我接纳及行为问题的现状及团体心理辅导效果评价*.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医科大学.
- 刘葭斐, 王兆良, 李文兵, 周超, 齐海静, 胡典. (2010). 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与领悟社会支持及孤独关系研究. *中国学校卫生*, 31, 180-181.
- 刘磊, 符明弘, 范志英. (2010). 流动儿童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适应性的相关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6, 144-147.
- 刘霞. (2008). *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 特点、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 刘晓瑛, 宋媛, 陆艳红, 冯梅珍, 顾珏. (2006). 苏州市4—5岁流动人口家庭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7, 389-392.
- 刘正荣. (2006). *进城就业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扬州大学.
- 鲁长芬, 王健, 罗小兵, 胡庆山. (2005). 城市农民工参与全民健身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 10-12.
- 吕文清. (2005). 透析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中国教师*, (5), 9-18.
- 马莉. (2002). 流动人口子女生活技能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 *教育科学研究*, (11), 53-54.
- 苗元江, 赵姗. (2009). 从社会幸福感到积极心理健康模型——Keyes 介评. *心理研究*, 2, 13-16.
- 明庆华. (2003). 论教育中弱势群体子女受歧视问题. *中国教育学刊*, (5), 11-14.
- 邱达明, 曹东云, 杨慧文. (2008). 南昌市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 *中国健康教育*, 24, 33-37.
- 屈卫国, 钟毅平, 燕良弼, 杨思. (2008). 初中生农民工子女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 589-590.
- 申继亮. (等著). (2009). *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发展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孙维平, 胡韬, 郭跃勤, 周林海. (2007). 重庆市某小学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状况. *中国学校卫生*, 28, 68.
- 孙晓莉. (2006).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性现状研究. *现代教育科学*, (6), 20-21.
- 谭千保. (2010). 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8, 68-70.
- 陶红梅, 许燕, 张小方, 顾莉莉, 洪金侠. (2004).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9), 86-91.
- 田澜. (2004). 我国中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27, 502-504.
- 王飞. (2009). 五省部分地区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调查. *社会心理学*, 24, 55-59.
- 王瑞敏. (2007). *北京市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 王瑞敏, 邹泓. (2008). 流动儿童的人格特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28, 82-87.
- 王瑞敏, 邹泓. (2010). 北京市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4, 131-134.
- 王洋. (2007).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及其与教师互动风格关系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师范大学.
- 夏延芳. (2007). 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现代农业科技*, (12), 165-169.
- 杨小艳. (2007). *进城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现状及原因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湖北大学.
- 殷世东, 王守恒. (2009). 城市“流动学生”行为失范及其应对策略——基于安徽省阜阳市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学术交流*, (12), 238-241.
- 袁立新, 张积家, 苏小兰. (2009). 公立学校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中国学校卫生*, 30, 851-853.

- 曾守锺. (2008). 城市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教育学术月刊*, (3), 27–29.
- 曾守锺. (2009). 流动儿童的自尊及其稳定性和保护作用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7, 64–69.
- 翟蕾, 黄娜. (2008). 北京市海淀区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29, 590–591.
- 张枫, 王洁, 殷兰青, 任智红. (2003). 无锡市部分流动儿童生活质量分析.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11, 352–353.
- 张华, 谢云天. (2008). 8岁—13岁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与学习习惯研究. *教育测量与评价 (理论版)*, (2), 35–37.
- 张秋凌, 屈智勇, 邹泓. (2003). 流动儿童发展状况调查——对北京、深圳、绍兴、咸阳四城市的访谈报告. *青年研究*, 9, 11–17.
- 赵景欣. (2007). 压力背景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保护因素与抑郁、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 赵淑娟, 郑秀娟, 刘嘉邦. (2009). 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研究——现状及启示.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 1020–1022.
- 郑友富, 俞国良. (2009).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与人格特征研究. *教育研究*, (5), 99–102.
-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 (2006).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 *改革*, 5, 5–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2011-04-28, 取自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 周芳. (2002). 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 *教育科学研究*, (11), 54–55.
- 朱丽娜. (2008). 进城农民工子女城市适应状况调查——以武汉市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 邹泓, 屈智勇, 张秋凌. (2004). 我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生存和保护状况调查. *青年研究*, (1), 1–7.
- Achenbach, T. M., McConaughy, S. H., & Howell, C. T. (1987). Child/adolescent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mplications of cross-informant correlations for situational specific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 213–232.
- Alati, R., Najman, J. M., Shuttlesworth, G. J., Williams, G. M., & Bor, W. (2003). Change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amongst children of migrants to Australia: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5, 866–888.
- Beiser, M., Hou, F., Hyman, I., & Tousignant, M. (2002). Poverty, family proces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immigrant children in Canad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 220–227.
- Bengi-Arslan, L., Verhulst, F. C., van der Ende, J., & Erol, N. (1997). Understanding childhood (problem) behavior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Comparison of problem behaviors and competencies in Turkish immigrant, Turkish and Dutch children.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2, 477–484.
- Bhugra, D. (2004).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09, 243–258.
- Branz-Spall, A., & Wright, A. (2004). A history of advocacy for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More than 30 years in the fields. In C. Salinas & M. Fránquiz (Eds.), *Scholars in the Field: The Challenges of Migrant Education* (pp. 3–4). Charleston, WV: ERIC Clearinghouse on Rural Education and Small Schools
- Elder, J. P., Litrownik, A. J., Slymen, D. J., Campbell, N. R., Parra-Medina, D., Choe, S., et al. (2002). Tobacco and alcohol use-prevention program for Hispanic migrant adolesc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3, 269–275.
- Griffin, J., & Soskolne, V. (2003).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Israe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7, 769–774.
- Guarnaccia, P. J., & Lopez, S. (1998). The mental health and adjustment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childre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7, 537–553.
- Hackett, L., Hackett, R., & Taylor, D. C. (1991). 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 and its associations in the children of the Gujarati Community. *Journal for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2, 851–856.
- Harker, K. (2001). Immigrant generation, assimilation,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ocial Forces*, 79, 969–1004.
- Hicks, R., Lalonde, R. N., & Pepler, D. (1993). Psychosoci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childre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12, 71–87.
- Hovey, J. D., & Magaña, C. G. (2002). Psychosocial predictors of anxiety among immigrant Mexican migrant farmworkers: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8, 274–289.
- Jasinskaja-Lahti, I., & Yijälä, A. (2011). The model of pre-aculturative stress-A pre-migration study of potential migrants from Russia to Fin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5, 499–510.
- Kupersmidt, J. B., & Martin, S. L. (1997).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hildren of migrant and seasonal farm workers: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6, 224–232.
- Leavey, G., Rozmovits, L., Ryan, L., & King, M. (2007). Explanations of depression among Irish migrants in Britai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5, 231–244.
- Lindert, J., von Ehrenstein, O. S., Priebe, S., Mielck, A., & Brähler, E. (2009).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labor

- migrants and refugee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 246–257.
- Major, B., Quinton, W. J., & McCoy, S. K. (2002).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ttributions to discrimin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4, 251–329.
- Mejía, O. L., & McCarthy, C. J. (2010). Acculturative stres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migrant farmwork college students of Mexican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17, 1–20.
- Peplau, L. A., & Perlman, D. (1982). *Loneliness: A source book of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pp. 1–18). New York: Wiley.
- Stevens, G. W. J. M., & Vollebergh, W. A. M. (2008). Mental health in migrant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 276–294.
- Stevens, G. W. J. M., Pels, T., Bengi-Arslan, L., Verhulst, F. C., Vollebergh, W. A. M., & Crijnen, A. A. M. (2003). Parent, teacher and self-reported problem behavior in the Netherland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8, 576–585.
- Stillman, S., McKenzie, D., & Gibson, J. (2009).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8, 677–687.
- Vollebergh, W. A. M., ten Have, M., Dekovic, M., Oosterwegel, A., Pels, T., Veenstra, R., et al. (2005). Mental health in immigrant children in the Netherland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0, 489–496.

Mental Health for the Children of Farmers Who Worked in City in China

XIONG Meng; YE Yi-Du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children of farmers who worked in city refer to the group of those whose parents have the identity of peasant, the farmland by contract, but are mainly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ake the salary as their main source of income. They are generally the children of 6 to 18 who are at the right age to schoo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m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urban children. In social cognition, they have a certain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 feeling of relatively depriving and some identity crisis. In emotion and feeling, the imbalance of emotion, tendency of lonely (depression) and feeling of inferiority (self-accusation) are often serious. In social adaption, the social maladjustment, interpersonal tension and sensation, poorer learning adaptability and more behavior problems are obvious. Furthermore, the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ge, personality, coping styl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ogether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factors from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o their mental health. In addition, the education intervention for them are lack of systematization, which mainly are some qualitative researches. As a result, the broadening of study objects and contents, the improvement of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re the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hildren of farmers who worked in city; mental health; mechanism; education intervention